# 错过了富春山，可别再错过桐君山！

陆春祥

从南北朝至明清，一千九百余位诗人为桐庐留下了七千四百余首诗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桐庐的古诗词，一定列全国诸县首位，李白、孟浩然、王维、孟郊、白居易、罗隐、贯休、范仲淹、苏轼、陆游、朱熹、杨万里等，仅唐宋就有五百二十多位著名诗人留下一千四百多首诗。

诗人为什么来桐庐？壮游、隐逸、宦游、考察、神游、避乱各色缘由皆有。他们奔着天下独绝的奇山异水而来，他们也奔着在此隐逸的东汉名士严光而来。

宋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被关入御史台监狱，他弟弟苏辙看不下去，为哥哥请罪：愿用自己的官职为哥哥赎罪。宋神宗生气了，苏辙本来就因反对新法被贬，神宗不仅不准，还贬苏辙为江西高安的盐酒税官，而且下了死命令，五年内不准升调。五年后，苏辙才被调为绩溪县令。次年四月一日，神宗去世，哲宗继位。八月，旧党执政，召苏辙为秘书省校书郎。苏辙要回京，他本来拟定好的路线是，从宣城沿着长江走，但苏轼给了他另外一个建议：弟弟不如过歙溪，泛富春江看风光，再到钱塘，看看哥哥我在杭州的朋友。苏辙想，这个建议太好了，于是一路行，一路看风景。

沿新安江直下，这就到了睦州地面，用不了多时，船就会到严陵滩，他准备上去，拜谒一下严子陵。不想，这船速度还挺快，过严陵滩时正好半夜，船工不敢喊他。清晨醒来一看，呀，前面已经是桐庐县城了，云雾缥缈中，桐君山上桐君寺隐约可见，甚是可爱，苏辙对着船工大喊：

慢一点，慢一点，我们往两江口靠，我要上桐君山——

其一

扁舟匆草出山来，
惭愧严公旧钓台。
舟子未应知此恨，
梦中飞楫定谁催。

其二

严公钓濑不容看，
犹喜桐君有故山。
多病未须寻药录，
从今学取衲僧闲。

（《舟过严陵滩将谒祠登台舟人夜解及明已远至桐庐望桐君山寺缥缈可爱遂以小舟游之二绝》，苏辙《栾城集》卷十四）

苏辙错过严子陵隐居的富春山，是憾事，但也不后悔，他知道，身系官场的人，是不能和严子陵相比的，多少人和严光见面，都感觉到深深的惭愧。

幸好，前方还有名山，错过了钓台，再不能错过桐君山。

苏辙游山，过程一定不复杂，看山进祠拜桐君，他想的是这位悬壶济世的老人，在此隐居，此地确实是个好地方。由桐君想到他自己，身历宦海多年，浮浮沉沉，还拖着一身病痛，眼前这位著名的医生，一定对自己有所帮助。看着桐君老人，想着自己以后的日子，唉，多留点时间给自己吧，你看看，那些僧人，居住在桐君老人隐居的地方，闲闲的神态，真是令人羡慕呀！

几乎每个上山的诗人，都会对桐君老人感叹一番。然而，他们终究离不了俗世，苏辙一到杭州，直奔上天竺，他要去见他哥哥的老朋友辩才和尚。不知是大师云游去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苏辙这一次没见着辩才，只得遗憾地留下《寄龙井辩才法师三绝》，然后，急匆匆赶往官府驿站，他要去陪高丽国来的一位僧人游钱塘，这是朝廷的命令，不敢怠慢。

古人像苏辙那样直接上山拜谒桐君而留下的诗词，我们至少能看到两百多篇。

宋末元初的方回，虽然人品为人所讥，但他在严州做了七年知州，后来又继续住了五年，与桐庐的关系紧密，他甚至将自己的诗文集命名为《桐江诗集》《桐江续集》。一个作家的写作时间，有几个十二年？方回以桐江来命名自己的作品集，可以想见他对桐庐的深厚感情。

方回也写了多首关于桐君的诗，看他的《寄题桐君祠》：

问姓云何但指桐，
桐孙终古与无穷。
遥知学出神农氏，
独欠书传太史公。
可用有名留世上，
定应不死在山中。
休官老守惭高致，
政恐犹难立下风。

在方回眼里，桐君是个神奇的传说。虽然不知桐君姓名，但他的朋友孙潼发写了《桐君山志》，虽不如司马迁写《史记》著名，但他和桐君一样会流芳百代。名师出高徒，方回断定，桐君一定是跟神农学的医术，他留下的药学原理造福于众人。桐君的精神不死。我现在老了，和桐君的功绩相比，没什么建树，真是有点愧对他。

方回面对桐君，似乎有一种难言的羞愧，难怪他一直不肯拜一拜桐君，十二年来，“犹数往来桐君祠下。然未尝一登所谓小金山致瓣香焉”（诗题自注）。他晚年往来于家乡歙县与杭州之间，卖文为生。公元1292年，方回替好朋友作序，写下了上面这首诗。富春江水清澈，方回的心灵似乎得到了洗涤。

# 翙岗村水澳修筑时间的文献学考察

宋旭华

凤川街道翙岗村是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三部门列入的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之一，是浙江省历史文化名村。村里的水澳是古人兴修的水利设施，是当地通自来水之前主要的饮用和灌溉水源，为乡人生活提供了便利。《民国桐庐县志》载：“上澳：水出大小两源，溉田千余亩。下澳：水出谷井，溉田千余亩。……谷井：为翙岗七社所共有，水甚清，溉田千余亩。……中澳：源出甘溪中部，溉田三百余亩。”县志记载有上澳、中澳、下澳（谷井）三条水澳，中澳离村较远具体位置不详、是否尚存不详，试从古籍记载分别讨论上澳与下澳（谷井）的修筑时间。

## 一、上澳

浙江省文物局编《浙江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丛书：水利设施》对翙岗水系（上澳）有介绍：“水系自竹筒坞口大源溪取水，取水口在大源溪南岸溪床下，筑地下暗渠约300余米至狮虎山乌石坨露头，向西约300余米明渠后分为二股，一股进入村中，一股引向田野。进村渠水以暗渠进入村中，沿村中老街西行经李家、方家、张家和凤岗自然村进入石桥头村，全长600余米。……村民反映20世纪70年代维修水系，可进入暗渠，其中有一大石上凿有至正字样。”介绍文字之前将水系修筑的时间判断为“明—清”，过于大略；而“一大石上凿有至正字样”，也许村民确实看到了有“至正”字样的石头，但由于没有实物资料，该石头也有可能是后人用元人刻过的石头再利用，并不能作为确证。

《万历严州府志》：“以下十澳并国朝洪武二十七年遣官修筑：龟潭澳、杨梅澳、上澳、上泉澳、莲塘澳、章村澳、漩潭澳、陈婆澳、深澳，俱在县东南”，记载了明初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官修上澳之史实（细数为九澳，原文作“十澳”）。《明通鉴》卷十“洪武二十七年”谈到朱元璋督修水利事：“乙亥，遣国子监生分行天下，督修水利。上谕工部曰：‘湖堰陂塘，可蓄泄以备旱涝者，因地势修治之。’复谕诸生曰：‘周时井田制行，有潴防沟遂之法，故虽遇旱涝，民不为灾。秦废井田，沟洫之利尽坏，于是因川泽之势，引水溉田而水利兴，惟有司奉行不力，则民受其患。今遣尔等分行郡县，毋妄兴工役，毋掊克吾民。’寻给道里费，遣之。”《明通鉴》卷十一“洪武二十八年”对督修的水利事进行了统计：“是冬，河渠之役，各郡邑交奏，凡开塘堰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水利既兴，田畴日辟，一时称富庶焉。”上澳当是明初兴修的众多的水利设施之一。

上海图书馆藏《桐南凤岗李氏宗谱》（三十二卷）“德行传·隐松公”，有隐松公李棐对上澳“开凿成渠”的记载：

隐松公讳棐字廷弼，行箕七十一，原行英六，智慧果敢，卓越流俗。村西平畴数百顷，皆赖灌溉，稍旱辄无获，而村之东溪泉下游不能西注，人莫能筹也。公为之度地势，欲凿澳引泉以灌溉，遂呈当道，领库银数千两，独肩其任，募工开凿成渠，由乌石溪经凤冈村，引东溪之泉以灌西畴，名曰上澳。利济民田，悉成腴壤。事告竣，众工感公之德为垦田数亩。里有与公有隙者，以开田事诬公用官费营私产，当道以擅耗见罪。公不置辨，尽鬻家产以偿库金。又杨梅古澳亦公疏浚，民田俱受其利。

家谱与府志对于上澳的记载有出入，单以“募工开凿成渠，由乌石溪经凤冈村，引东溪之泉以灌西畴，名曰上澳”，认为隐松公李棐为上澳“开凿”的主事人，当不确切。从史料的层级来说，府志、国史处于高位，有官方色彩，比一般的家谱，其史料效能更大。笔者认为：上澳在洪武二十七年时已经存在；李棐“凿澳引泉以灌溉”，从目前“一股进入村中，一股引向田野”来看，他开凿的是上澳引流的“引向田野”的支线，由于水流相通，时间一长就辗转相混了。

结合抗金名将李纲四世孙李瑶仪于南宋绍熙三年（1192年）迁入桐庐翙岗，若干代后已经蔚为大族，有人认为上澳在宋元时就已经开掘。这种观点于理有据，但缺少文献支撑，也许随着文献的进一步发掘和考古得到新的证据，上澳开掘的时间可以更早，丰富《万历严州府志》的记载。

## 二、下澳（谷井）

谷井边上有凤川镇（现凤川街道，下同）人民政府2006年立的《谷井碑》：“元至正间，刘基应李康之请寓居翙岗，时值大旱，村民焦虑。刘基为之筹，越数里于雷坞口，截溪下之水，筑暗渠，入地及丈延至狮山。旋分二渠，一入翙岗、石桥，开口若干以为埠。一穿田野阡陌，敞口数处以为潭。地下之水汹涌，旱情顿解，民用顿足。谷井者，其潭之一也。地位村口，其水清冽，其量沛然，村民极爱之。谥为‘流谷之井’，谷井之谓也。数百年来，谷井依然，不弃不舍。新中国成立后，虽水利新修，农田扩造，道路拓展，政府保护之意弥坚。值此盛世，立碑言志：水乃生命之源，发展之根本。唯保护水源，方能开万世之伟业。凤川镇人民政府立。二OO六年一月。”1992年桐庐县水利水产局内部发行的《桐庐县水利志》“引水（附井、泉）”：“谷井潭：在凤川乡凤岗，传说系明时刘伯温令士兵挖掘而成。现潭长11米，宽10米，深2米，水清见底，供饮水洗涤灌溉。”《桐庐县水利志》“传记、故事”：“凤岗村‘国井潭’，水清澈，大旱不竭。相传刘伯温微时路过凤岗村，渴热难当，唯其地干旱，遍找无水，一老妪见之，将家存仅一小杯水奉予，刘伯温感甚。后刘任军师，带兵复经凤岗村，为报当年百姓赐水之恩，即令士兵挖井潭一口，即今之‘国井潭’。自此，凤岗村人饮水无忧，路人皆乐。”“谷井潭”与“国井潭”两者一音之转，为同一地方。由于这些都是当代文献，只是以传闻的形式把谷井与刘基联系起来。

《桐南凤岗李氏家谱》有一部留有明人“俞谏”撰写的《月泉公行状》：

月泉公行状（行茂二）

公讳盛，字日新，月泉其别号也。先世居闽之邵武，至忠定公之孙讳泰任东安令，乔居于临安之新邑，泰子瑶议，始迁于桐南之凤冈，传十四世而生公焉。公之大父云泉翁，尊君云壑翁。世世以清白传家，忠厚垂训，识者早卜其克昌厥后矣。至公之昆季有四，而公居其次。幼时读书穷理，诸子百家无不通晓。性孝友，不惟分尊而年长者不敢慢，即分尊而年幼亦必循分尽礼，未尝以惰容接之。时与名儒硕士相交游，矢口皆古之格言，见者莫不器重之。厥后废儒业，善筹画于农桑，展经纶于贸易，制行端方，处心仁厚，尚质直，厌浮华，崇礼教，黜异端，仁厚之称遍乎乡邑，而居积日以丰裕，尝曰：大丈夫当顶天立地，自为创业，不可株守也。至昆季析爨时，固将街东之祖居，悉让之伯仲，而独于街西之荒烟蔓草间开荆棘，辟草莱，经画基址若干亩，缔造厦宇数百楹，不雕琢，不粉饰，惟敦古处尚朴茂。为裕后计，则规模之恢宏，冠于乡邑。至于经画南亩，善度地势，于乾溪之滨凿井得泉，大旱不竭，名曰谷井。可以灌西北之原隰，而乐利无穷，称神异焉。生平尤好善乐施，周乡邻之贫乏，释闾里之忿争，其慈惠忠厚，出于至性，人之沐公惠而薰公德者，不可缕数。故时人有乐善翁之称。居恒训其子若孙曰：吾家忠厚相承，汝曹务宜勤俭，持家和平，处世毋好勇斗狠以贯祸，毋贪财嗜酒以取戾。古人云：为善最乐。汝曹当以是为念。子若孙咸曰：谨受教。配前村徐孺人，出自名门，素娴闺训，淑德明章，善相夫子。举丈夫子三，长曰洙，即余侄婿也；次曰沛，娶下林吴县尹之侄媛；季曰淑，娶方佥事之裔孙女。各五子，长曰枝，次曰標，曰梧，曰柏，曰樬，曰榣，曰栋，曰栾，曰楹，曰梯，曰榖，曰檥，曰枢，曰栝，曰橓，各择配名家女，咸能成立，克绍箕裘，而曾孙林林绕膝目睹者四十八人。一女适在坊姚推官之次子姚备。公之夫妇，偕白首之欢，三子效斑斓之舞，诸孙挺立，矫矫不群。善绘者写月泉行乐图一卷，多名儒诗赞以记其盛德之光辉，而发祥于一室者贻于后。予明姻戚之雅，悉公之行，慕公之德，且重余侄之请，故乐为之状云。公生于景泰癸酉年正月十二日，卒于嘉靖癸巳年五月初九日，享寿八十有一。徐孺人生于景泰庚午年四月十一日，卒于嘉靖壬辰年十月初九日，享寿八十有三。时大明嘉靖十三年岁次甲午春正月上元之吉，资善大夫都察院左御史太子少保姻家眷弟俞谏顿首拜撰。

该行状披露了有关谷井开凿的信息：“至于经画南亩，善度地势，于乾溪之滨凿井得泉，大旱不竭，名曰谷井。可以灌西北之原隰，而乐利无穷，称神异焉”。对其考证，其中的“乾溪”，繁体的“乾”应作简体的“干”。因为这条干溪虽然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其边上南北向道路的名字，在当地的方言中被称为“旱溪滩”而保留了读音。当地方言把音跟字联系在了一起。旱与干同义，干溪或也叫旱溪，这一定程度上与家谱的记载相呼应，而“干”（或“旱”）也就是掘井的动因，逻辑相符。需要指出的是，《月泉公行状》署为明代名臣桐庐人俞谏所写，当属伪托。

谷井水流向西北约200米处，是翙岗行政村石桥自然村的上门古澳口，澳口边的石碑上刻有“大明正德七年岁次壬申七月吉旦建立”。综合家谱与石刻提供的信息，则在正德七年（1512年）农历七月（在李盛60岁时），谷井的下游上门古澳口建成。由于必先有井而后才有水流，有水流而后才可在下游建澳口，且两地相距不远，虽不能肯定上门古澳口也是李盛所建，但可推论谷井建成时间的下限是1512年。《民国桐庐县志》有关水旱灾的记载：“大旱：宣德九年。大旱：景泰七年。自六月至八月不雨：弘治元年。自六月至八月不雨：正德元年。自五月至八月大旱：正德三年。自五月至十一月不雨：嘉靖三年。水：正德六年八月，田禾卑下者皆无获。自芒种至夏至，洪水不泄：嘉靖元年，禾苗多被害。大水：嘉靖十八年六月，霪雨，坏民庐舍，市郭平地水高二丈余。”卷十四“灾异”记录到地方志中的灾异，实际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可见在李盛的这一生中，尤其是正德年间（元年、三年、六年），水旱灾特别是旱灾，是频发的，这段时间兴修水利非常必要。故推论谷井的开掘在“1512年前很近的一段时间内”，应该是达到“乐利无穷”这一实际效果的。

综上，上澳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下澳（谷井）距今有500多年的历史，至今仍然在使用，是村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可谓是活的古代水利遗址。浙江省考古所郑殷芳先生出版了《桐庐江南地区古代引水系统与传统村落》，以“古代引水系统”命名，认为：“桐庐江南地区引水工程的系统性、完整性，区域规划的合理性、水工设施的独特性，堪称古代乡村水利工程的典范，代表着所处时期中国古代水利规划与工程技术的较高发展水平。”翙岗的上澳、谷井就是这个引水工程系统的典型代表。郑殷芳先生亲口告诉笔者，已故知名文博专家、历史学家毛昭晰先生曾提到：桐庐江南的水利灌溉工程要申报世界遗产。衷心希望这些活的古代水利遗址能得到充分的保护，有朝一日能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兰石斋杂记（三十六）

# 王学仲作《严子陵钓台文》

蓝银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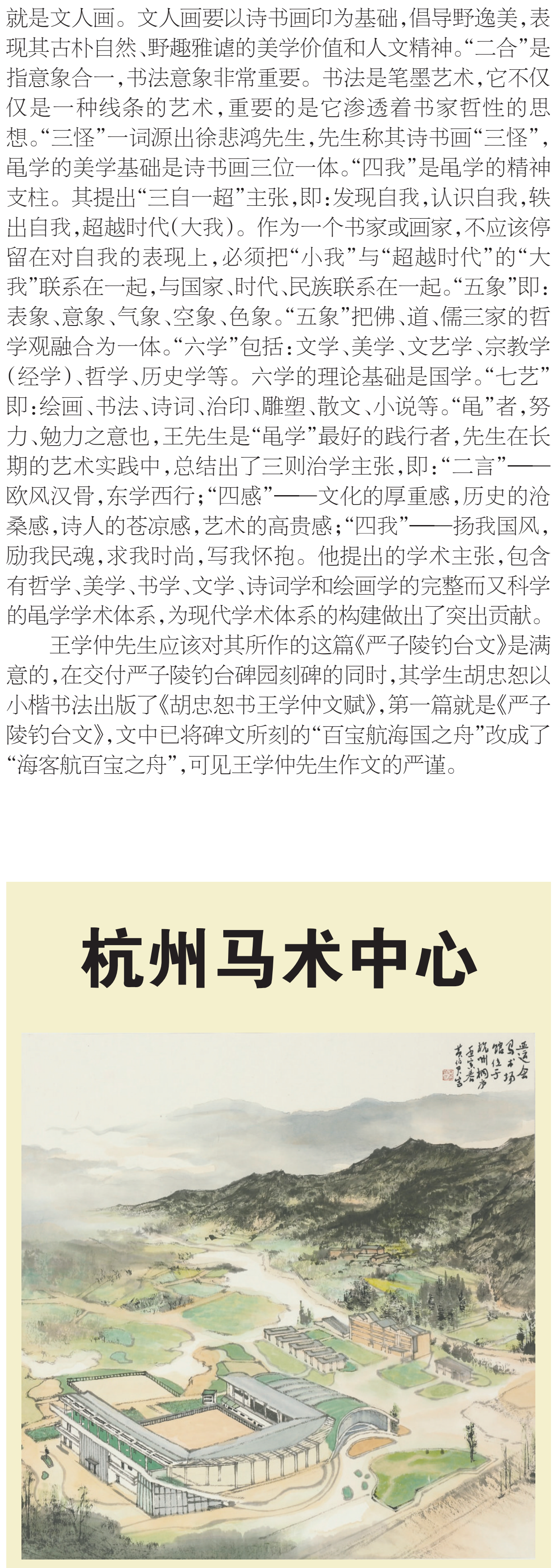
严子陵钓台碑园在规划时，就拟在碑园中心位置以照壁形式立一通记叙兴建碑园盛举的纪念碑墙，一面刻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富春山段，一面是请天津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王学仲教授作一篇《严子陵钓台文》，王先生对此不厌其烦，根据我们寄去的资料，撰写了文辞优美的《严子陵钓台文》。文中提出严子陵的隐居，是因为严子陵“独乐胜于江又钟情于山水之乡者深矣，夫重山川之胜于仕宦，悦钓台之胜于云台”的观点。王先生没有到过桐庐，但文中对桐庐的风景名胜的描写，令读之者身临其境，先生坚实的文赋功底令人赞叹。在来信中先生坦率地表示：“拙文请位有点名气而善于楷或隶者书之最好，因字数多，无特殊关系，一般书家重金钱而不愿写，像我这样愿以文会友的人不多了，……碑文刻后赐予一张拓片作为酬劳就可以了。”先生风格实在令人感动。征集委员会根据碑刻识读实用和王先生意见，请浙江书法家孙钊先生以楷书书写了《严子陵钓台文》，孙钊先生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第一、二、三届理事。擅长楷书、行书，曾为辽宁关东碑林、河南韩愈碑林、安徽圣泉碑林、山东孔庙碑林等书碑。碑文刻好后，我拓片后寄王先生，先生回函评价：“孙君书法，挺健可喜……”

事实上，王学仲先生本身就是书画大家，碑园在请其作文的同时，也请先生书写了行书沈约《严陵濑》诗碑。先生出生于山东省滕州市宁家村一个书香人家。5岁就跟着教书的父亲上学，开始学写毛笔字，十七岁考取了北平京华美术学院国画系，师从邱石冥、吴镜汀、容庚、齐白石、黄宾虹等学习书画。1946年夏天，徐悲鸿先生就任北平国立艺专校长。王学仲的才华得到了徐悲鸿先生的赏识，在徐先生的鼓励下，王学仲到北平国立艺专深造。徐悲鸿先生曾经在王学仲请教的书法册页上题写道：“呼延生（王学仲先生有别名‘呼延夜泊’）方在少年，其书得如是造诣，秉赋不凡，盖由天授。方之古人，在唐则近于北海，宋则山谷，明则倪文正、王觉斯，而非赵董世俗之姿可相并论也！”

王学仲先生不仅是一位诗文、书画皆有建树的文化学者，还是一位具有独立见解和开拓精神的书画理论家、美学思想家。先生斋号“黾斋”，是“黾学学派”的创始人，黾学可以概括为：一画、二合、三怪、四我、五象、六学、七艺。“一画”就是文人画。文人画要以诗书画印为基础，倡导野逸美，表现其古朴自然、野趣雅谑的美学价值和人文精神。“二合”是指意象合一，书法意象非常重要。书法是笔墨艺术，它不仅仅是一种线条的艺术，重要的是它渗透着书家哲性的思想。“三怪”一词源出徐悲鸿先生，先生称其诗书画“三怪”，黾学的美学基础是诗书画三位一体。“四我”是黾学的精神支柱。其提出“三自一超”主张，即：发现自我，认识自我，轶出自我，超越时代（大我）。作为一个书家或画家，不应该停留在对自我的表现上，必须把“小我”与“超越时代”的“大我”联系在一起，与国家、时代、民族联系在一起。“五象”即：表象、意象、气象、空象、色象。“五象”把佛、道、儒三家的哲学观融合为一体。“六学”包括：文学、美学、文艺学、宗教学（经学）、哲学、历史学等。六学的理论基础是国学。“七艺”即：绘画、书法、诗词、治印、雕塑、散文、小说等。“黾”者，努力、勉力之意也，王先生是“黾学”最好的践行者，先生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总结出了三则治学主张，即：“二言”——欧风汉骨，东学西行；“四感”——文化的厚重感，历史的沧桑感，诗人的苍凉感，艺术的高贵感；“四我”——扬我国风，励我民魂，求我时尚，写我怀抱。他提出的学术主张，包含有哲学、美学、书学、文学、诗词学和绘画学的完整而又科学的黾学学术体系，为现代学术体系的构建做出了突出贡献。

王学仲先生应该对其所作的这篇《严子陵钓台文》是满意的，在交付严子陵钓台碑园刻碑的同时，其学生胡忠恕以小楷书法出版了《胡忠恕书王学仲文赋》，第一篇就是《严子陵钓台文》，文中已将碑文所刻的“百宝航海国之舟”改成了“海客航百宝之舟”，可见王学仲先生作文的严谨。

# 杭州马术中心



作者：黄伯君　原画作：70×70厘米